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SN 2095-6924, CN 36-1328/F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业用工模式的运作机制与形塑逻辑
作者：梁伟
收稿日期：2025-08-28
网络首发日期：2025-09-30
引用格式：梁伟.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业用工模式的运作机制与形塑逻辑[J/OL].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36.1328.F.20250930.0951.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业用工模式的运作机制与形塑逻辑

梁 伟

(1.北京工业大学 社会学院, 北京 100124; 2.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 北京 100124)

摘要：基于劳动力组织机制的分析视角，结合多个农业产业化地区案例，探讨农业用工模式的实践特征、运作机制与形塑逻辑。结果表明：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与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组织型用工逐渐成为农业用工的重要模式，具有农业用工市场化委托和劳动监督外部化转移的双重特征。组织型用工的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嵌入式整合”，包括关系嵌入与劳动力资源整合、市场嵌入与用工需求整合、权力嵌入与非正式组织自我整合等三方面。组织型用工模式既是农村劳务市场发育的结果，也是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农民家庭理性选择和地方经济精英推动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据此，建议从制度层面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提供政策支持，进而提升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以此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关键词：乡村产业振兴；农业用工；组织型用工；嵌入式整合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aping logic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mod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Liang Wei

(1.School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 2.Beijing Research Base for Social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labor forc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combined with the cases of multipl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reg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shaping logic of the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l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featuring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oriented entrustment of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external transfer of labor supervisi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can be summarized as "embedded integration",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labor resource integration, market embedding and employment demand integration, and power embedding and self-integration of informal organiza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model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收稿日期：2025-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4CSH129）

作者简介：梁伟，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与基层治理研究，liangwei1813@163.com。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labor market, but also the product jointly shap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the rational choices of farmers' families, and the promotion by local economic elites. In view of this,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provided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labor market to enhanc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labor force,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cause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rganizational employment; embedded integration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提升农业用工的配置效率是持续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改革提升了劳动力配置效率^[1]。正是通过劳动力配置方式的调整，中国农业得以摆脱内卷化和过密化困境^[2]。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进城与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已成为影响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3]。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农村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理应实现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因此，如何优化农业用工的管理模式，进而提升农业用工的配置效率，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亟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学术界关于农业用工模式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研究视角。一是家庭发展视角，该视角重点关注家庭生计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策略。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农户通常遵循劳动力数量配置、劳动力质量配置和劳动力灵活配置等原理^[4]。在城镇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农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推动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5]。由于农民的市场化动力和能力存在差异，农村地区逐渐形成本地务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强工弱农”，以及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等劳动力配置形态^[6]。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领域转移，“半耕”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半工”则获得更多发展机会^[7]。在此背景下，为了平衡资源积累与子女抚育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家庭形成“一家三制”的劳动力配置形态^[8]。二是用工体制视角，该视角主要探讨农业用工的配置效率问题。熟人社会的小农用工体系兼顾理性与道义双重逻辑，这种用工体系为农民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配置方式^[9]。相对于熟人社会中的劳动力配置，资本化农业时常遭遇劳动力短缺与雇工监督困境。为应对这些困境，资本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克服上述困境：通过改造传统农业经营体系并转变村庄农业用工模式，以获取雇工管理的自主权^[10]；通过包工制雇用外地劳工，形成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11]；依托扎根乡土社会关系网络^[12]，通过在地化管理和本地化雇工等方式，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13]。三是要素配置视角，该视角着重探讨农业用工模式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劳动力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劳动力配置^[14]。另一方面，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比例呈正相关关系^[15]。土地确权改革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农地流转市场，显著降低农户外出务工的比例^[16]。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家庭农场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生产，进一步加速劳动力转移进程^[17]。此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回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8]。

综上，已有研究围绕农业用工模式展开了丰富讨论，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空间。首先，已有研究未能从乡村社会的整体视角出发认识农业用工问题，无法呈现农业用工的基本形态和运作机制，进而也无法阐释乡村社会中农业用工的底层逻辑。其次，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形态、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较少聚焦于农业用工模式的组织方式，难以廓清农业用工模式的组织形态。最后，已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的配置，但对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配置关注不足，尤其缺乏对近年来出现的农业务工队等新兴现象的深入探讨^[19]。因此，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和田野调查，从劳动力组织机制的角度，呈现农业用工模式的实践类型，并重点探讨组织型用工模式的实践特征、运作机制及形塑逻辑。本文的案例材料来自笔者于 2021—2024 年在云南昆明市、山东寿光市、湖北梁子湖区、甘肃临泽县等多地开展的专题调研。笔者在重点关注农村劳动力问题的同时，还关注了地方市场、村庄结构、家计模式等方面的内容，这为理解农业用工模式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

二、农业用工模式的类型及其特征

农村劳动力配置并非完全自发的市场过程，而是受特定组织机制的影响与形塑。一般来说，劳动力配置形态与农业用工需求、劳动力结构、村庄结构和劳务市场等多种因素高度相关，这些因素共同形塑了农业用工的组织机制。

（一）农业用工模式的实践类型

结合实践来看，用工强度和配置规则是形塑农业用工组织机制的两个核心变量。前者主要影响劳动力配置数量，后者则主要影响劳动力配置方式。在经营规模稳定的前提下，用工强度受生产环节复杂程度的显著影响，生产环节越复杂，农业用工强度就越大。配置规则受社会结构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当社会结构发挥较大作用时，配置规则由社会关系、人情等社会性因素主导；当市场化力量发挥较大作用时，配置规则主要由市场性因素主导。基于上述讨论，构建农业用工模式的理想化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业用工模式的实践类型			
用工强度	配置规	社会化	市场化
	低强度	关系型用工（Ⅰ类）	分散型用工（Ⅱ类）
	高强度	合作型用工（Ⅲ类）	组织型用工（Ⅳ类）

Ⅰ类代表的是关系型农业用工模式，这是熟人社会中较为普遍的农业用工模式。在关系型用工模式下，农户基于人情关系的考虑相互帮工和换工。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情形主要发生在关系紧密的亲戚和邻居之间，这在小农用工体系中尤为典型。

Ⅱ类代表的是分散型农业用工模式，当用工强度较低且需要雇工时，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劳动力，这种模式在特色产业地区较为常见。在分散型用工模式下，农业经营主体的用

工需求有限且用工形式灵活。经营主体与劳动力之间虽构成雇佣关系，但由于处于乡村社会场域之中，仍然受到乡土规则约束。

Ⅲ类代表的是合作型农业用工模式，主要出现在用工强度高、村庄社会结构完整的地区。在合作型用工模式下，农户之间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通过自发合作的方式应对农业生产中的高强度用工需求。

Ⅳ类代表的是组织型农业用工模式，当用工强度较高且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劳动力时，该模式随之生成。在组织型用工模式下，经营主体只需与组织化的务工队进行对接。在务工队内部，劳务经纪人作为务工队的组织者，在组织型用工模式下，劳动力配置的组织主体由经营主体转变为劳务经纪人。

（二）组织型用工模式的发展及其特征

在农业用工需求增加、季节性劳动力不足的情形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扩大劳动力资源的搜寻范围。问题在于，农业经营主体在村庄范围之外寻找劳动力的能力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地区还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基于日益增加的农业用工需求，乡村社会逐渐形成组织型用工模式。组织型用工模式是指，农业经营主体雇用组织化的务工队开展生产，只需与劳务经纪人对接，便能获得所需的农业工人，从而解决季节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组织型用工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农业用工的市场化委托。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需求与村庄劳动力结构性不足之间的张力，农业经营主体在用工量较大时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其普遍将用工量较大的生产环节外包给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务工队。在山东寿光蔬菜产业中，乡村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劳务服务队，专门在县域范围内为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务工队一般由1个劳务经纪人和若干个工人组成，总人数约10~40人。劳务经纪人主要负责寻找务工机会、对接农业经营主体及组织工人开展生产。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劳务经纪人负责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因此务工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在务工队内部，劳务经纪人是农业劳动力组织化的枢纽，其不仅要有效组织起来，还需要对劳动力进行管理，同时为劳动力寻找合适的务工机会。

第二，劳动监督的责任转移。在对接农业经营主体之后，劳动力接受劳务经纪人的统一管理，以组织化的方式回应农业经营主体的用工需求。劳务经纪人与农业经营主体达成口头协议后，劳务经纪人必须按照农业经营主体的要求组织生产。劳务经纪人一方面要为工人分配工作任务，另一方面要监督工人的劳动过程以确保劳动质量。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经营主体与劳务经纪人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如果劳务经纪人无法保证劳动质量，农业经营主体便能通过扣减劳务报酬的方式约束务工队。

可以看出，在组织型用工模式下，经营主体以市场化雇工为基础获取组织化的劳动力资源，且借助务工队的内部管理将劳动监督职责向外转移，这不仅实现了高强度用工需求与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匹配，进而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时也回应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降低用工主体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交易成本。

三、嵌入式整合：组织型用工的运作机制

结合前文来看，组织型用工模式以劳务经纪人为组织枢纽。劳务经纪人向上对接经营主体，向下对接分散劳动力，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社会关系实现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高效适配，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劳动力低效配置问题和经营主体用工困境，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本文将组织型用工模式的运作过程概括为“嵌入式整合”，其包含对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市场信息的整合、对劳动过程的有效监督等三方面内容。

（一）关系嵌入与劳动资源整合

将分散在乡村社会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是组织型用工模式有效运行的前提。在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农业经营主体往往由于市场信息有限而难以低成本地获取劳动力，劳务经纪人便成为联结供需两端的组织枢纽。面对日益增长的用工需求，劳务经纪人开始组建务工队，并依托社会关系整合劳动力资源。在组建务工队的过程中，劳务经纪人需要具备如下特质。一是拥有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劳务经纪人常年在本地生活，在地方社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经营头脑或经营能力，劳务经纪人常年参与地方市场且熟悉地方规则，通交际能力较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然，劳务经纪人组建务工队不仅需要个人能力，还需要拥有整合劳动力资源的能力。实践表明，关系嵌入是劳务经纪人获取劳动力资源的关键。

组建务工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劳务经纪人需在熟人社会中收集劳动力信息，并将适宜的劳动力吸纳到务工队中。劳务经纪人充分动员其社会关系网络，依托熟人关系寻找劳动力资源，如请其他村的熟人帮忙联系或介绍工人，抑或通过现有务工队的成员介绍工人。与此同时，劳务经纪人借助社会关系对工人进行筛选。由于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劳动态度和技能水平存在差异，其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也存在差异。因此，劳务经纪人在组建务工队伍时，需要筛选劳动能力强、劳动态度好和技能水平高的工人。在熟人社会内部，劳务经纪人对工人较为熟悉，工人信息也高度透明，劳务经纪人更易对劳动进行筛选。然而，在村庄场域之外的区域搜寻劳动力时，劳务经纪人就必须依赖熟人进行把关。由于在熟人关系中双方高度信任，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熟人介绍的劳动力相对可靠。

概而言之，劳务经纪人和工人的合作关系建立在地方社会的熟人关系或半熟人关系之上，这使得劳务经纪人与工人的关系既具有市场合作性质，又具有社会互动性质。这种关系形态既有助于发挥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效应，也强化了劳务经纪人与工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对务工队的长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除此之外，这种关系形态也属于“市场化的组织关系”，即劳务经纪人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对接市场主体，二者之间的互动也主要围绕劳务市场内部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劳务经纪人的关系嵌入行为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二）市场嵌入与用工需求整合

组织型用工模式要实现劳动力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在实践中，劳务经纪人需要积极开拓市场，保证农忙时有充足的用工需求，以此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劳务经纪人来说，市场嵌入是其有效获取市场信息且整合市场需求的关键途径。

首先，劳务经纪人在本地具有一定知名度，其长期活跃于地方市场，对乡村社会的市场信息和交易规则十分熟悉。不少劳务经纪人长期在本地务工，积攒了丰富的市场资源和人脉。当地方社会出现大量用工需求时，劳务经纪人只需要设法将务工队伍组织起来，就可以有效匹配自己积攒起来的市场资源。劳动经济人处于地方市场中的信息节点，这是其相较于普通工人的绝对优势。

甘肃临泽劳务经纪人 ZL，长期带着 7~8 名工人在本县范围内务工，提供玉米去雄、收获、打药、播种、间苗等环节的劳务服务。ZL 之所以能找到市场资源，原因在于他很早就给别人打工，全县 70 多个行政村至少去过一半。随着经营主体的用工需求不断扩张，他们主动联系 ZL 提供劳务服务。除此之外，ZL 还通过微信、QQ 等线上方式获取市场信息，如在各个乡镇的信息服务群、经营主体群发布劳务信息，增加务工队的知名度（访谈编号：20240925ZL¹）。

其次，劳务经纪人需要与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稳定合作关系，一方面为了稳定市场资源，另一方面便于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务经纪人与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稳定合作关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务工队的劳动质量。地方市场中存在多支务工队，彼此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劳务经纪人必须保证务工队的劳动质量，才能市场中积累声誉，从而在保障既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市场。二是劳务经纪人与农业经营主体的关系建构。经营主体与劳务经纪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是否稳定，还受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即使务工队的劳动质量相差无几，农业经营主体仍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用工偏好。因此，劳务经纪人主动构建并维护与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在地方市场中，务工队之间不仅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合作关系。劳务经纪人经常遇到自身务工队无法单独满足经营主体用工需求的情况，此外，劳务经纪人需要联系其他务工队进行协同工作。正因如此，务工队之间形成既竞争又互补的市场关系。

（三）权力嵌入与非正式组织的自我整合

在组织型农业用工模式下，工人与农业经营主体各司其职。农业经营主体与劳务经纪人进行“一对一”联系，劳务经纪人根据用工需求组织劳动力完成劳动任务，并在此过程中成为联结劳动力与经营主体的中介枢纽，同时充当组织者、沟通者与管理者的角色，从而实现对务工队的监督管理。在上述过程中，权力嵌入是劳务经纪人有效管理务工队的重要机制。吉登斯^[20]指出，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所运用的两种重要资源，构成了行动者权力的基础。在务工队这种非正式组织中，劳务经纪人拥有的配置型资源主要是市场资源，其权威型资源则主要包括个人权威、劳动分配权力以及控制工人进入与退出的权力。上述两方面的资源构成劳务经纪人权力嵌入的基础。

首先，劳务经纪人依托市场资源形成对工人的强约束。务工队为工人有效对接市场提供了条件，有助于降低个体工人直接面对市场的交易成本和潜在风险。除此之外，务工队能够保证工人每天都有活干，这比工人直接寻找经营主体更为便利。一般情况下，劳务经纪人都会控制务工队

¹ 遵循学术惯例，已对人名进行匿名处理；访谈编号以“访谈日期+访谈对象姓名首字母”进行编排，如 20240925ZL 表示 2024 年 9 月 25 日，ZL 表示被访谈对象姓名的首字母。

规模，以实现市场需求与务工队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平衡。正如涂家垅镇 NSS 所言，“工人既不能太多，又不能太少，太多了养不住人，太少了无法满足需要”（访谈编号：20220822NSS）。由于劳务经纪人能够保证稳定的务工机会，工人更愿意加入务工队。正因如此，劳务经纪人通过配置型资源获得管理劳动力的权力，从而实现对工人的有效约束。

其次，劳务经纪人依靠权威型资源对工人形成强约束。劳务经纪人大多拥有丰富的务工经验，不仅对农业生产环节较为熟悉，而且劳动效率较高，出色的业务能力使其具备个人权威。正如云南昆明劳务经纪人 LZ 所说，“当工头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条是什么都要会干，这样才好监督别人，不然你说什么别人凭什么听你的；另一条是要在劳动时压得住其他人，干不赢就压不住别人。跟我一起干活的工人都认可我，因为我干活比他们厉害，如果工人有意见，就和我比一比，干不过就得听我的”（访谈编号：20250515LZ）。在充分利用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劳务经纪人严格监督劳动过程。如果有工人劳动效率较低，劳务经纪人就会催促其加快进度。如果工人不好好干，劳务经纪人可以不再雇佣他。对个体工人而言，脱离务工队意味着务工机会减少，因而绝大多数工人选择服从管理。

综上，在组织型农业用工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劳务经纪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通过关系嵌入推动劳动力资源从碎片化到组织化的转变，形成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整合，为高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奠定了基础。二是通过市场嵌入获取大量市场信息，并以此为基础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对用工需求的整合。三是通过权力嵌入的方式有效管理和监督务工队伍，实现非正式组织的自我整合。基于此，乡村社会实现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有效适配。

四、组织型用工模式的形塑逻辑

组织型用工模式既是农村劳务市场发育的结果，同时也是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农民家庭理性选择和地方经济精英推动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上述三重力量共同催生出组织型用工模式，使其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一）用工需求扩张下的市场激励

在小农户家庭经营阶段，劳动力配置主要围绕家庭生产展开。当家庭劳动力无法完成生产任务时，小农户通过关系型用工或合作型用工方式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伴随着农业经营规模化，农业经营主体的用工需求不断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组织型用工模式的发展。

在乡村社会中，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取劳动力存在困难。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且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部分生产环节用工需求极大，进一步加剧农业经营主体的用工困境。以甘肃临泽县的玉米制种产业为例，由于玉米去雄和收获环节受制种企业生产计划的限制，经营主体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生产，经营规模在 1.5 公顷以上的农户普遍需要雇工。另一方面，农忙时节易出现劳动力挤兑问题。农业产业化地区普遍形成多元化经营格局，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忙季节，小农户需要完成自家的农业生产，无暇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服务。因此，农业经营主体或雇用外地劳动力解决用工问

题，或等待本地劳动力完成自家的生产活动。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时效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劳动力资源，但超出村庄范围之后，新型经营主体寻找劳动力的能力相对有限。基于用工需求扩张以及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约束，地方社会形成了通过高效配置劳动力以解决用工困境的市场需求。在这种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地方社会逐步形成专业化务工市场，激励组织型用工模式的发展。

（二）家庭生计结构的优化动力

劳动力是农民家庭的成员之一，因而劳动力配置还受农民家庭决策的影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村劳动力进一步释放，且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然而，少数中老年劳动力无法外出，或是年龄较大，是有家庭成员需要照顾，因而具有不完全市场劳动力的特征。如果仅仅耕种承包地，这部分劳动力无法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农民家庭形成年轻人务工、老年人务农的“半工半耕”结构。在城乡流动的过程中，农民家庭生成了发展型家庭目标，农民家庭的再生产模式也从简单再生产转变为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农民家庭不仅要完成家庭继替的任务，还要实现社会流动和跨越式发展的任务。农民家庭必须举全家之力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中老年一代仍然要为年轻一代提供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家庭需要优化家庭生计结构，实现劳动力配置的效益最大化。

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中，存在以子代为主的“半工”和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的“半耕”二元结构。随着中老年劳动力兼业化，“半耕”部分已转变为“半兼”，“半工半耕”结构逐渐转变为“半工半兼”结构，即“以子代为主的半工结构+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的半兼结构”。不完全劳动力虽然无法适应城市务工市场，却能较好地满足乡村社会的用工需求。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务工机会具有不确定性和碎片化特征，用工相对自由，不完全劳动力恰恰是较为灵活自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务工机会主要以农业用工为主，具有“去技术化”特征，因而在村劳动力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的用工需求。基于此，农民家庭就有了“务工+务工+务农”三份收入。正因为农民家庭产生了优化生计结构的动力，其更愿意在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基础上兼业经营，从而大大增加地方社会的劳动力供给，促使组织型农业用工模式逐渐形成。

（三）农业用工体系的组织重塑

在村庄社会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分布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并产生如下消极影响。第一，务工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由于农村劳动力普遍较少且居住相对分散，劳动力之间的熟悉程度相对较弱，地域社会中就业信息传递受到影响，经常出现劳动力找不到务工机会和经营主体找不到劳动力的现象。第二，分散劳动力对接市场时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雇工需要花费更多精力搜寻市场机会，且在雇工分散的情形下，用工主动权掌握在经营主体手中，雇工的议价能力较差。第三，劳动力配置的心理成本增加。对于雇工来说，增加务工机会就必须动员社会关系，这意味着雇工必须“欠人情”，这种亏欠感会降低雇工搜寻务工机会的动力。除此之外，劳动力组织体系的缺失也使得劳动力配置效率难以提升。在常规用工模式下，劳动力的获取与监督完全依赖于农业经营主体自身。

由于获取劳动力信息的能力有限且农业用工需求具有灵活性，农业经营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劳动力组织。在实践中，地方社会中的经济精英逐渐发展成为劳务经纪人。地方精英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资源实现劳动力资源与用工需求的双向整合，从而推动分散劳动力的组织化。劳务经纪人与经营主体直接对接，并根据经营主体的用工需求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上述变化意味着，农业用工体系实现了组织重塑，即劳动力组织结构从“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农业经营主体-经纪人-农村劳动力”结构。在这种组织体系下，农业用工具有以下双重效果。一是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议价能力；二是降低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同时也回应了乡村社会中的用工需求。当然，这套组织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组织成本，即劳务经纪人的报酬，如“烟钱”“电话费”“车费”等。

综上所述，组织型农业用工模式受到多重逻辑形塑，包括用工需求扩张下的市场激励、家庭生计结构的优化动力以及农业用工体系的组织重塑。在上述三重形塑逻辑下，组织型用工成为农业产业化地区重要用工模式，对于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多地田野经验，从劳动力的组织机制出发，探讨农业用工模式的实践特征、运作机制与形塑逻辑，以此阐释乡村产业振兴的人力基础。农业用工模式并非自发过程，而是由特定的组织机制决定的。结合实地经验来看，用工强度和配置规则是影响劳动力组织机制的核心因素，由此产生了关系型用工、合作型用工、分散型用工和组织型用工等四种类型的农业用工模式，前两种属于社会化用工模式，后两种属于市场化用工模式。随着农业用工需求不断增加，组织型用工逐渐成为农业用工的重要模式。在实践中，组织型用工具有农业用工市场化委托和劳动监督外部转移的双重特征，其通过劳务经纪人的嵌入式整合机制，向上对接用工主体，向下对接分散的农村劳动力，实现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有效适配，有效提升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实践表明，组织型用工模式既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农业用工需求、农民家庭理性决策和地方经济精英等多重因素的形塑。在上述三重力量的共同形塑下，组织型用工成为农业产业化地区的重要用工模式。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逐步建立健全农村劳务市场的规范管理制度，通过正式制度保障乡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建立规范化的工资支付、工时计算、医疗保障等管理秩序，促进农村劳务市场健康发展。其次，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农业劳动力组织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农业劳动力就业需求进行摸排。另一方面，积极为农业务工队链接市场资源，推动地域范围内劳动力供需匹配。村集体应当将劳动力纳入统一管理平台，便于随时为劳务队提供服务。再次，地方政府应当扶持地域性劳务组织发展，鼓励务工队成立专业合作社或行业协会，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为农业劳动力创造一个稳定的就业市场。最后，地方政府应当构建短期用工需求与长期用工稳定需求的平衡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本地的劳动力供给。另一方面，建立更加畅通的劳动力流

动渠道，便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从而为劳动力增收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 [1] 蔡昉.改革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重新配置[J].中国农村经济, 2017 (10): 2-12.
- [2] 黄宗智.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J].开放时代, 2021 (1): 157-168.
- [3] 纪月清, 黄晓彤, 方晨亮, 等.中国农业劳动力利用“去内卷化”变迁: 基于近百年的资料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24 (9): 15-29.
- [4] 华国锋.论农户兼业行为的劳动力配置原理: 兼谈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对策[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 (4): 46-51.
- [5] 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3 (6): 1-6.
- [6] 甘颖.农村养老实践类型差异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23 (2): 122-131.
- [7] 印子.乡村社会“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及其解释: 基于华北乡村案例的观察[J].人文杂志, 2023 (1): 113-122.
- [8] 刘超.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家庭策略与发展型家庭秩序: 基于“一家三制”的讨论[J].宁夏社会科学, 2022 (1): 161-167.
- [9] 李永萍.理性与道义: 熟人社会中的劳力配置逻辑[J].北京社会科学, 2016 (9): 30-38.
- [10] 望超凡.从适应到自主: 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1): 134-143.
- [11] 陈航英.田野里的工厂: 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研究[J].开放时代, 2020 (3): 168-187.
- [12] 孙新华, 吴楠.关系化用工: 农业规模经营的社会基础[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 (3): 90-97.
- [13] 贺亮, 张翼.在地化: 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管理实践[J].农村经济, 2021 (2): 1-11.
- [14] 马小勇.家庭禀赋、个人特征与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J].贵州社会科学, 2017 (10): 146-155.
- [15] 方师乐, 赖慧颖, 黄祖辉, 等.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农业生产率提升的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3 (11): 86-101.
- [16] 郑冰岛, 朱汉斌.农地产权、流转市场与农村劳动力配置[J].人文杂志, 2019 (6): 120-128.
- [17] 罗明忠, 刘雨朦, 魏滨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 “安居”与“乐业”[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 (3): 263-272.
- [18] 唐若迪, 吉小燕, 陈超.生产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劳动力配置的优化作用: 基于成员就业决策和家庭收入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 2023 (4): 52-63.
- [19] 梁伟.规模经营背景下的农业多元用工行为探析: 基于鄂中涂家垸镇的案例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 2025(4): 144-167.
- [20]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猛, 李康,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241.